

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国公众对日情感的影响:

以信息沟通分析为中心

武萌* · 金详圭**

요 약

중국과 일본의 조어도(센카쿠 열도) 분쟁은 중일 관계에 심각한 영향을 끼치고 있고 이로 인해 중국 국민의 반일 정서는 더욱 더 악화되었다. 지금까지 반일 정서는 역사 문제를 비롯해 여러 가지 이유로 촉발되어 왔다. 하지만 최근의 영토 분쟁은 중국 국민의 반일 정서를 전국적이고 지속적인 형태로 변화시켰다. 이러한 변화의 기저에는 일본의 정치 우경화가 자리잡고 있으며 일본이 최근 벌이고 있는 역사적 사실의 왜곡과 진실의 호도 역시 일본 정치의 우경화에서 비롯되었다고 볼 수 있다. 본 논문은 일본 정치 우경화 문제를 연구의 출발점으로 삼아 정보 소통의 시각에서 격화된 중국 국민의 대일 감정 변화와 일본의 정치 우경화가 어떤 인과 관계를 형성하고 있는지 분석하고자 한다.

주제어: 일본, 정치 우경화, 조어도 분쟁, 중국 국민, 반일 정서

* 中国清华大学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博士

** 中国清华大学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博士候选人

I. 问题的提出

卡尔·多伊奇的沟通交往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认为：一体化(integration)指标的提高以沟通的模式(方法)和交往(Communication)的数量为依据，沟通能产生共同的思想、观点和行动，沟通是维持组织存在的基础。通过沟通，可以培养认同(the sense of we-ness)(Emanuel Adler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1988, 7)。该理论是对北大西洋地区一体化案例后得出的结论，历史发展似乎证明了沟通交往理论的正确性：在该理论提出30多年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完结，至今仍然存在并发展。如果北约只是一个传统的军事对抗性质的集团，那么当它存在的主要原因苏联灭亡时，理论上这个共同体应该解散。而现实是北约正在不断地调整、扩大，而且类似欧安组织、欧洲联盟等也获得了加强并不断扩大(Deutsch 1964, 77)。

然而，在亚洲特别是韩日之间、中日之间的状况却与“沟通交往理论”相反，出现了交流越多好感度越差的现象。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7个国家开展了针对日本、英国等多个国的关于“对世界是否产生积极影响”的大规模民意调查，据其2007年3月公布的结果显示，其中24个国家的回答多数认为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是积极的，与法国和欧盟一样得到了肯定评价。但中国、韩国等国家的公众对日本的态度却与此反差巨大：中国方面，认为积极的是18%，认为消极的是63%；韩国方面，认为积极的占31%，认为消极的占58%(金子将史·北野充 主编 2010, 139-142)。为何在韩国、中国这两个与日本交流最多、经济和文化等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的数据与其他地区的数据呈现如此大的差距？本文试图以中国公众对日态度为案例，考察中国公众对日态度变差的原因，也希望能对韩国的研究做一个比较和借鉴。

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交流的规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为何两国公众相互间的态度越来越差？我们分析发现1992年左右是中国公众对日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分水岭，从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至1992年中国公众对日态度都比较好，1993年起迅速下滑，这与1993年日本政治右倾主义的抬头在时间上是一样的。根据这一阶段特征本文试图以1992年为界划分为1972年至1992年和1993年至2013年两个阶段，对比前后两个时期考察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国公众对日态度的影响。

II. 理论分析框架与变量界定

公众依赖有关信息形成对特定对象的认知，与认知对象有关的信息的性质决定公众认知的形成和变化。信息传播的模式主要以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为代表的有线性模式、以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为代表的控制论模式和德福勒互动过程模式为代表的系统论模式三种，其衍生模式还有强调信息传播对微观个体影响的“两级传播模式”、强调信息传播对宏观社会影响的“议程设置模式”、强调受众中心的“使用与满足模式”和强调中间媒介与行为体系的模式等。而现有模式共有的三个基本要素是强调沟通过程中的信息发出者、中间媒介和受众(董璐 编 2010, 15-40)。

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指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渐占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是日本政界和社会右翼政治势力为核心，企图通过修改教科书、恢复靖国神社地位、美化侵略历史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政治思潮。这不仅影响两国国民间的好感度、领导人间的信赖关系，并事关日本战略走向，可能会对中长期的中日关系造成更大的干扰(刘江永 2007, 163-167)。

1993年至2013年的20年，日本政治右倾化迅速抬头并不断发展有

多方面的原因，而国内原因是其产生的根源，首当其冲的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的迅速衰退。所以，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主流被迅速打破：经济界需要新的增长点、民众需要更好的生活，日本政治右倾化最终出现。于是，以军工产业和大财阀为代表的经济实体为代表对修改战后和平宪法表现相当那个积极，企图打破禁止武器出口的原则，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日本政治右倾化潮流从1985年中曾根内阁时期已开始出现，其表现为：右派势力控制政权，中间偏右派在国会、媒体等主流社会领域占主导。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主张：要保卫日本美丽的自然和领土，保卫日本人民的生活及生活价值，保护自由市场经济，保护日本民族在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活力和民族气魄（中曾根康弘 1984, 102）。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后，日本的政治右倾化进入明显发展阶段，小泉执政5年连续6次参拜靖国神社，否定侵略历史的教科书修改事件等频频激化。2004年4月，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曾表示，“我切身感受到整个日本政界都在右倾”（河野洋平2004）。2006年5月，日本前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也指出，小泉改革使日本过度往右走了（本泽二郎著 2002, 61）。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政局来看，小泉纯一郎内阁执政的2001年至2005年，其极端的右倾化姿态导致中国公众对日强烈反感，之后连续不断的中日东海大陆架化问题、钓鱼岛群岛主权的争端问题频频激化严重影响了中国公众的对日好感度。从当下的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发展趋势来看，日本右倾化越来越厉害。民主党菅直人内阁、麻生太郎内阁并没有将注意力落在3·11大地震的灾后重建上，再次组阁的安倍晋三的强硬对华姿态连续挑战着中国公众的底限，以大阪市长桥下彻及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老将则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后备军。

现有关于中国公众对日态度变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靖国神社参拜、历史教科书事件、遗留化学武器、劳工索赔、

钓鱼岛争端、东海划界争端等为代表历史问题、领土领海问题引发的两国争端所致；第二，爱国主义教育为代表的中国政府舆论导向所致；第三，中日实力对比变化和两国关系进入结构性矛盾期所致；第四，日本与台湾关系问题导致的双边关系变化所致；第五，美国因素及日美同盟的对华政策影响所致。在这诸多因素中，要考察造成中国公众对日态度变差的本质原因和内在规律，找到科学、可靠的因果关系，需要将各种观点和因素进行合并同类项操作和变量控制。很多问题与韩国很相似。

第一类因素主要包括：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等，属于日本对侵略认识的问题，这类问题时常激化并影响中国舆论变化。

第二类因素主要包括：东海划界争端、钓鱼岛群岛争端历来是影响中国公众态度变化的核心因素之一，每次激化都伴随中国公众的剧烈反抗，因为领土领海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官方和民间没有差别。

第三类因素主要包括：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日美同盟插手台湾问题和美国因素是战后以来一直干扰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国公众对日本和美国态度变化的重要因素。

第四类因素主要包括：中日实力对比变化、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日本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低谷期，以战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55体制”也终于1995年宣告结束，日本国内政治的平稳格局被打破。同时期的中国步入崛起轨道，经济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期，国民生产总值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

第五类因素主要包括：将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国政府的舆论导向作为中国公众对日态度变差的原因，这是日方右翼学者主观的有罪推定，根本无法成立。爱国教育为世界所有所重视，作为曾是日本交战国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可谓最强，无论美国的官方文件、学生教科书、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记录和宣传

数不胜数，美国公众的对日态度并不差，2012年2月至3月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对日本的信赖度保持在84%左右，精英阶层高达90%；对日本的印象项目中，91%的人认为日本拥有很高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90%的人认为日本的动漫、时尚产品、美食等拥有很高的影响力。¹⁾ 二战时遭受德国、意大利纳粹迫害极为慎重的欧洲诸国以纳粹德国、纳粹意大利等为题材的爱国主义教育从未停止，也并未导致欧洲公众的对德国的普遍反感，其有力证据是以法国、德国为中心的欧盟的持续发展。更有利的反例是，在中日关系“黄金时代”的1972年至1992年，抗日题材的电影电视剧等比现在多得多，但并未导致如今强烈反日情绪。日本学者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国公众对日好感度变化不构成因果关系(石井健一 2008, 177-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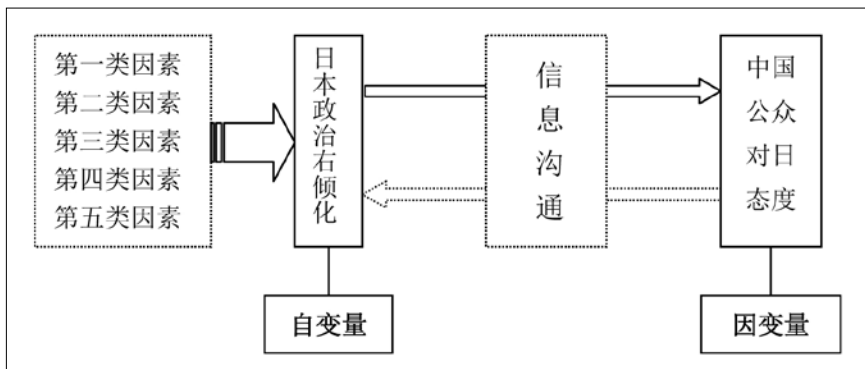
第六类主要是指战时日本遗留在华的化学武器、中国劳工对日索赔诉讼问题等属于战争遗留问题，这类问题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公众对日态度产生影响。但此类问题不具有普遍性，而且激化频率不高，不能归根本影响因素，也不构成中国公众对日态度变化的充分必要条件。

1972年至1990年代初，这些问题虽然这类问题也时常激化，但激化的频率并不高；从1993年开始，这类问题频频激化严重影响了中国公众对日厌恶感比例的迅速上升。这时间变化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出现在时间上是一样的。

通过对现有关于影响中国公众对日态度变化(因变量)的影响因素(自变量)分类和简析，第六类因素属于小范围影响因素，不具普遍意义，与因变量的因果关系不能成立；前五类因素有共同的发生条

1) 日本外务省舆论调查数据,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24/5/0522_03.html.

〈图1〉 变量关系



件，即日本政治右倾化，与因变量可以构成因果关系。同时，作为自变量的前五类因素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具体表现，其激化或发生的频率、趋势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所以我们的核心假设是：日本政治右倾化(自变量)是影响中国公众对日态度变化(因变量)的主要原因。为了使研究更具科学性，便于衡量和观察，自变量衡量指标我们选取前五类因素中所有因素的激化频率(次数)，因变量的衡量指标选取中国公众对日好感度(%)，考察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性。

公众依赖信息(Information)形成对特定对象认知(Cognition)，与认知对象有关的信息的质量决定公众认知的形成和变化。在本文的假设中，信息沟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是一个干预变量。信息沟通的质量也影响到公众的认知形成，公众认知的形成与接收信息条件，起到加强或干扰公众态度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硬条件主要指信息获取条件，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条件和舆论形成环境；软条件主要指公众的信息接收条件和接收能力，比如识字率、兴趣爱好等。所以，我们在考察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作用结果时，还需要考虑到信息传播的环境、条件和速度等因素。但需要实现明确的是，信息环境的变化只是起到

加强或削弱的作用，并非公众认知产生的决定变量。内因决定外因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日本政治右倾化才是决定性变量和充分必要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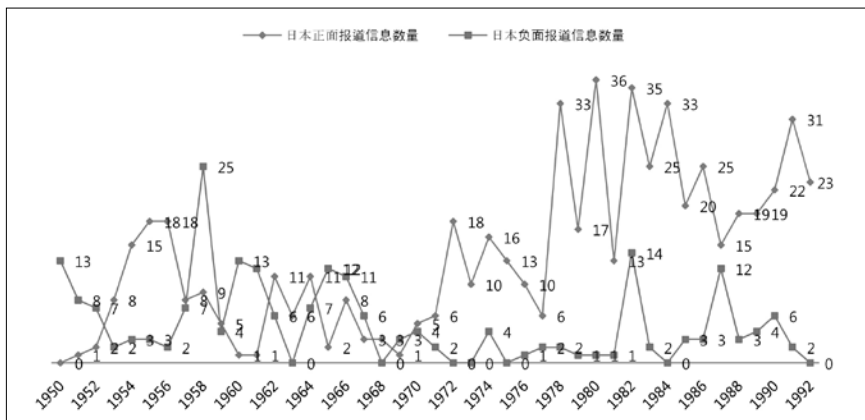
III.日本政治右倾化潜在期的中国公众对日好感度(1972-1992)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至1992年的20年被称为是中日关系的“黄金时代”，中日两国间的矛盾虽然时有激化，但整体而言日本政治右倾化并未显现。国际方面，国家利益决定对外政策的国际关系原理是正确的，中、美、日共同应对前苏联的共同需要是支撑本时期三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巨大动力。由于冷战格局下美苏实力对比的变化和中苏关系变差，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巨大转变，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这一时期中、美、日的共同的利益诉求为冷战中三国提供了空前的合作机遇。在美国的影响下，以日美基轴为外交政策指导的日本也迅速转变对华政策，共同的敌人形成了共同的战略利益诉求。

从中日双边关系看，两国复交至上世纪90年代，中日经济具有极强的互补性。1972年，两国关系回复邦交正常化后，经济方面，70年代初至80年代的日本国内社会正处于战后第二次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需要大量廉价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其充沛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物美价廉的工业品热衷于进入世界市场。中国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而日本在这些方面拥有国际领先的实力。高度的互补性是两国关系“黄金时期”的重要保障。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传递给中国的正面信息数量远远超过负面信息的数量。而本时期现代信息传媒技术尚未形成，中国公众接收信

〈图2〉 1972年-1992年年有关日本的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数量变化趋势



图表说明：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制作。数据资料来源：阎学通等著：《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335页。《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著名的数据来源有：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光盘》（1946—2003年）；日本驻华大使馆：《日中关系重要文献集》（2006年3月）；天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科出版社2002版；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11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徐之先主编：《中日关系三十年（1972—2002）》，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赵佳楹：《中国现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中国外交》（1996—200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中国外交概览》（1987—199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²⁾

息的途径主要来自官方主流媒体，这也有利于扩大官方信息传播效果。本时期源自日本的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的数量统计，如图2。

通过图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1972年至1992年的20年间，中日两国间的正面事件发生频率全部大幅高于负面事件的发生频率。这说明1972年-1992年的中日关系发展十分良好。从公众获取信息的角度来看，1972年-1992年关于日本的正面报道信息有439条，负面报道信息有61条；正面信息约是负面信息的7.2倍，有利于中国公众对日肯定认知的形成。

从民意调查结果来看，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中国公众对日态度

2) 统计说明：作为比较，统计数据往前延伸到两国为实现邦交正常化的1950年至1971年。

调查显示,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比率在70%—80%,对日本抱有好感度的比例接近历史高位的40%(刘志明 2003, 195)。1992年的民调显示,中国公众对日本的好感度比例比80年代末上升并一度达到历史最高的40%,且喜欢的比例一般高出讨厌的比例约10%。³⁾沟通是双向(two-way)的,我们对比一下本时期日本的民调数据:1979年至1988年的十年间,绝大多数日本公众对中国普遍抱有一种亲近感,数值大体维持在7成左右,这一比例与日本公众对美好感度不相上下。1980年,对华亲近感的比例达到78.6%,持有厌恶感的比例仅为14.7%。1982年,持有亲近感的为72.7%,超过对美国的71.4%,中国成为日本公众态度上最易接受的国家(林晓光 2010, 72-73)。1986年日本总理府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公众对中国持有亲近感的比例为75%,没有亲近感的比例为24.8%。同一调查显示,1989年日本公众对华有亲近感的比例较1988年下降16%,没有亲近感的比例增加了16.7%;1992年这一比例回升至53.8%(刘江永 2007, 572)。⁴⁾

这说明两国整体关系与释放给公众信息和公众态度变化成正相关关系,对比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前(1949年至1971年)的数据:两国整体关系良好时,更容易产生正面积积极信息,有利于公众肯定认知的形成;两国整体关系不好时,更容易产生负面消极信息,更容易导致公众否定认知的形成。加之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的舆论环境单一、信息传播技术较为落后造成信息传播统一度高这一加强变量的影响,1972年至1992年间中国公众对日肯定认知度较高。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调查中心(CRC)对日意识调查。转引自:刘江永著:《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2-573页。

4) 其中,1989年数据突然较大下滑的原因是天安门政治风波的影响。

IV.日本政治右倾化显在期的中国公众对日好感度(1993-2013)

本时期国际格局、中日双边关系环境和日本国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方面，上世纪90年代，伴随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中、美、日三国联手对付苏联的战略需要消失。以1989年中国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为原因，美国的对华战略迅速改变，联合美洲、欧洲、澳洲各国及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日本以日美基轴为中心的对外政策再次启动，对华关系自然也要与美国保持一致。然而，1992年日本天皇夫妇成功访华受到中国方面的热烈欢迎，并率先解除了对华制裁，作为日本近邻的中国，在原材料、市场让日本不得不重视对华关系。这也说明：第一，在对华关系上日本有不同于美国的意图，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决定其对外政策；第二，国际格局变化因素并非日本对华政策消极变化的决定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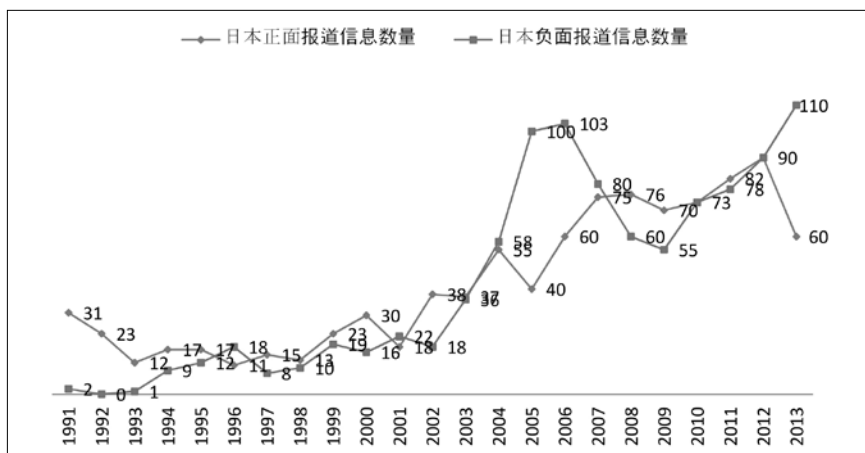
而双边层面，中日两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实力对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持续十几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下，经济结构、经济实力都获得了迅速提升，并最终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后，经济发展势头一蹶不振。但这并不能构成日本对华政策走向消极的决定因素。首先，日本在高科技产品、电子产品、汽车、环保、教育等众多主流领域仍然具有巨大的比较优势，在这些领域两国的互补性依然巨大，而且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消费也是日本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其次，中国的巨大发展和人们收入的迅速增加使由昔日的中国有世界工厂逐渐变成世界瞩目的消费大国，这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说90年代前中国经济对日本需求以官方为主的话，90年代以来则是民间需求爆发的时代，两国的经济利益关系十分紧密。

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右倾化的主要表现是上述以与中国的

钓鱼岛群岛主权争端和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靖国神社参拜问题、篡改教科书问题等为代表的五类事件的频频激化，而每一次激化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公众对日态度。在这一背景下，有关日本的正面信息数量远远少于由日本政治右倾化产生的负面信息的数量。而本时期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信息沟通方式和速度的巨大变化，公众的信息接收环境、接收速度以及干扰信息增多、公众兴趣点变得广泛等也对此起到了加强作用。本时期源自日本方面传递给中国公众的正面信息事件和由日本政治右倾化产生的负面信息事件统计，如图3。

通过图3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1)与1992年前时期相比，本时期有关日本的信息数量猛增，这跟信息技术和网络媒体迅速发展有关；(2)由于这一时期日本政治右倾化开始抬头，日本对华政策开始走向消极，矛盾激化开始增加，1993年至1995年，正面信息虽然仍多于

〈图3〉 1978—2013年有关日本的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数量变化趋势



表格说明：笔者根据中日关系事件数据统计制作。数据资料来源：图3的资料；人民网；中国外交部网站；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日关系》报道专题（2006—2013）。⁵⁾

5) 笔者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制作，其中数据统计截至2013年3月25日。

负面信息，但差距已经开始缩小，并且正负两方面的信息数量都呈增加趋势；(3)1996年负面信息数量首次超过正面信息数量开始，并且自是年起正负两方面信息的数量继续增加，两类信息数量差距继续缩小；(4)2001年负面信息数量再次超过正面信息数量，自当年起正负两类信息数量迅速增加，矛盾激化频率迅速提高，负向信息数量整体上超过正面信息数量。

对比上一时期的良好舆论环境，本时期日本政治右倾化导致的矛盾激化频率大幅提升，带给中国公众大量负面信息，而正面信息数量相对没有形成优势，很难形成对日的正面认知。对比本时期的民意调查数据，也基本与我们的分析结论相吻合。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调查显示，从1995年起讨厌日本的比例迅速上升，并开始超过喜欢日本的比例。2000年，中国公众讨厌日本的比例达到40%，喜欢日本的比率降至20%；2001年，讨厌日本的比例首次超过50%，喜欢日本的比例降至10%。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调查显示，中国公众对日本感到“很不亲近”和“不亲近”的比例占43.3%；2004年，这一比例升至53.6%。在日本，1995年日本总理府调查显示，认为日中关系良好的比率为45.3%，认为不好的比率为45.7%，后者首超前者；1996年的比率为51%和39%，情况继续转坏。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日本对中国有亲近感和没有亲近感的比例几乎各占五成。2003年，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降低为47.9%，没有亲近感的人比例为48%；2004年，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比例达到58.2%，比上年调查结果上升了10.2%；2005年，中国发生大规模涉日游行后，日本对中国没有好感或不太有好感的比例达到63.4%，对中国有亲近感比例降至32.4%(刘江永 2007, 571-576; 蒋立峰 2004, 13-14)。

V. 结论

日本的政治右倾化是导致中国公众对日态度持续变差的主要原因。具体说来，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时期至1992年左右，日本对华政策的主流是友好、合作，政治右倾化未显现，中国公众对日态度持续转好。而1993年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发展，严重影响了中国公众的对日好感度。日本政治右倾化是影响中国公众对日好感度的决定性因素，两者变化趋势呈正相关关系。

从信息沟通视角来看，日本政治右倾化导致中国公众对日态度变差的原理是：政治右倾化导致致使两国矛盾点频繁激化，由此产生了大量负面信息，负面信息的不断出现致使公众消极认知的产生。而未出现政治右倾化时，有关日本的正面大量产生，有利于中国公众对日积极认知的产生。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公众对日态度变差的原因是日本的政治右倾化，这与韩国公众对日本态度变差的原因应该是一致的。日本的政治右倾化是导致韩国、中国公众态度变差的主要原因，日本要想获得韩国、中国公众的好感，就必须停止右倾化。

因此，虽然中日两国经济活动、公众等各层面“沟通”的渠道和规模不断扩大，但在领土领海主权争端、历史认识等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未解决前，中日两国的并未实现真正的良好交流。日本右倾化的不断发展必将导致上述问题的频频激化，会大量涉日负面信息的产生。例如，当前不断发酵的钓鱼岛争端，是日本挑起的影响中国公众对日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安倍内阁右翼成员日前参拜靖国神社，及其在设立“主权独立日”上的民族主义发展倾向表明，日本的政治右倾化正在不断演进。由此导致的大量涉日负面信息的产生已是事实，中国公众对日态度的必将继续下滑，并且这对中国公众乃至韩国等亚洲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公众中，对日本负面认知将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好转。

这一结论从2013年英国BBC最新公布的国家形象全球公众问卷调查结果中可以得到验证，日本国家形象在国际整体排名中位列第4，排在德国、加拿大、英国之后，好于法国和欧盟。然而，中国公众对日本的差评率是74%，韩国公众对日本的差评率是67%，更有甚者北朝鲜对日本的好评率为0。⁶⁾ 这以结果支撑本文的结论。

[투 고 일 : 2013년05월22일]

[심사완료일 : 2013년06월25일]

[게재확정일 : 2013년06월25일]

6) http://www.globescan.com/images/images/pressreleases/bbc2013_country_ratings/2013_country_rating_poll_bbc_globescan.pdf

参考文献

- 金子将史 (Kaneko, Masafumi) · 北野充 (Kitano, Mitsuru) 主编 (eds.). 2010. 『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Gonggong Waijiao: Yulun Shidai De Waijiao Zhanlue). 北京 (Beijing)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
- 本泽二郎 (Honzawa, Jirō) 著, 张碧清 (Zhang, Biqing) 等 (et al) 译 (trs). 2002. 『小泉纯一郎面面观』(Koizumi Jinichirō MianmianGuan). 北京 (Beijing) : 学苑出版社 (Xueyuan Chubanshe).
- 石井健一 (Ishii, Kenichi). 2008. “中国人的反日意识—中国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Zhongguoren De Fanri Yishi - Zhongguo Minzu Zhuyi De Shehui Xinlixue Fenxi). 伊藤阳一 (Itō, Yōichi) · 河野武司 (Kōno Takeshi) 编 (eds.). 『新闻报道与市民对外国意识』(Xinwen Baodao Yu Shimin Dui WaiguoYishi). 东京 (Tokyo) : 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Keiō Gijuku Daigaku Shuppankai). 阎学通 (Yan, Xuetong) 等 (et al) 译 (trs). 北京 (Beijing) : 世界知识出版社 (Shijie Zhishi Chubanshe).
- 刘江永 (Liu, Jiangyong). 2007. 『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Zhongguo Yu Riben: Bianhua Zhong de Zhengleng Jingre Guanxi). 北京 (Beijing) :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 刘志明 (Liu, Zhiming). 2000. “中日相互舆论的变迁与媒体的作用.” (Zhong Ri Xianghu Yulun De Bianqian Yu Meiti De Zuoyong). 刘志明 (Li, Zhiming) 主编 (ed.). 2003. 『中日关系新思维与舆论』(Zhong Ri Guanxi Xin Siwei Yu Yulun). 北京 (Beijing) : NICCS出版 (Chuban).
- 日本外省 (Ribei WaiSheng). 2012. 『日本外省舆论调查数据』(Ribei Waisheng Yulun Diaocha Shuju).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24/5/0522_03.htm (검색일: 2012.05.22)

- 林晓光 (Lin, Xiaoguang). 2010. “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动轨迹及考察路径.” (Ribennen Zhongguo Guan De Biandong Guiji Ji Kaocha Lujing) 『国际形象与政治传播』 (Guoji Xingxiang Yu Zhengzhi) 1: 72-73.
- 蒋立峰 (Jiang, Lifeng). 2004. “中国公众对日本的不亲近感显著增强.” (Zhongguo Gongzhong Dui Riben De Buqinjing'an Xianzhe Zengqiang). 『日本学刊』 (Riben Xuekan) 6.
- 中曾根康弘 (Nakasone, Yasuhiro). 1984. 金苏城 (Jin, Sucheng) · 张和平 (Zhang, Heping) 译 (trs.). 『新的保守理论』 (Xin De Baoshou Lilun). 北京 (Beijing): 世界知识出版社 (Shijie Zhishi Chubanshe).
- 河野洋平 (Kōno, Yōhei). 2004. 演讲 (Yanjiang).
http://china.kyodo.co.jp/2004/sekai/20040429_204.html(검색일: 2012.05.24)
- Adler, Emanuel and Michael Barnett. 1988. “Security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utsch, Karl. 1964.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 Globe Scan. 2013. “The 2013 Country Ratings Poll.”
http://www.globescan.com/images/images/pressreleases/bbc2013_country_ratings/2013_country_rating_poll_bbc_globescan.pdf(검색일: 2013.07.25)

ABSTRACT

The Effect of Japanese Conservative Swing on Chinese Emotion towards Japan:
Analysis 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WU Meng

Ph.D.

Tsinghua University

KIM Sang Kyou

Ph.D.Candidate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over the Diaoyu Island (Senkaku archipelago) has been causing serious influence over the Sino-Japan relations and it has aggravated the anti-Japan feelings of Chinese. To this day, the anti-Japan feelings have been triggered by various issues including history. However the recent territorial dispute has transformed the anti-Japan feelings into a nationwide and a continuous form. On the basis of such change lies the conservative shift of Japanese politics and it can be deduced that such shift have led into the recent distor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misleading of truth. Therefore, this paper begins by studying the Japanese political conservative swing an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alyz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formed by intensified Chinese anti-Japan feelings and Japan's political conservative swing.

Keywords Japan, Political Conservative Swing, Diaoyu Island Dispute,
Chinese People, Anti-Japan Feeling